

周恩来“拒礼”的艺术

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，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“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、莲子、馓子、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。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，他们是知道的，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，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，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。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，作为偿付藕粉、莲子、馓子、工艺品的价款，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。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，请仔细研究，并望严格执行。”

信不足二万字，却意味深长。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、邓颖超的清廉风格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，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“拒礼”的艺术，也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品味。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首先是语气的把握。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，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“不对”，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。虽然如此，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，而是语气和缓、娓娓道来，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、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，然后才表明态度，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，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。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，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，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态度。

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。明朝有一则“悬鹅示众”的故事：一个周新的人担任司法按察使后，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鸭。他坚决不受，但送礼人已经留下烤鸭抢先出门了。于是，周新叫人把烤鸭挂在屋子后面，以后凡送礼者，他就让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鸭。从此，再没有人来周家送礼了。周新的清廉之举固然令人钦佩，然而，他

对礼品的处理考虑得并不十分周全，难道只有扔掉，使其坏掉一法吗？

相比之下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做法就显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。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。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，留下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，并变价以钱偿付；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针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，这就避免了浪费。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，用以偿付藕粉、莲子、馓子、工艺品的费用。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(404.80元)的四分之一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过答案。一次，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、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。周恩来知道后说：“我不需要。”他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，便嘱咐说：“给他寄50元钱去。”秘书说：“是25元，寄去50元，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。”他说：“多余的让他处理，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，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。”这两处细节令人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。

最后，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，要求淮安县委“仔细研究”并“严格执行”，此举更加耐人寻味。

随信寄的通知是《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》，《通知》的制订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。1960年，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，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，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，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。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，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，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五万斤鱼。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，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：“送中央五万斤鱼，简直胡闹。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？”“全国从今以后，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

条鱼，要做全面通报，严格禁止。”会后，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、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《通知》。《通知》共有五条规定，其中前两条是：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，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；各厂矿、企业、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，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，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。

中央《通知》是1960年10月发出的，周恩来办公室给淮安县委的信写于1961年1月16日，淮安县委的做法显然违反了这两条规定。周恩来嘱秘书随寄《通知》并要求“仔细研究”、“严格执行”，就是希望他们认真学习《通知》精神，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，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，让清和改正错误。

从亲情和乡情出发，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，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，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。是周恩来没有人情味吗？显然不是。周恩来对淮安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，他十分关心家乡建设，曾就建设新淮安作出过多次指示。在周恩来看来，请客送礼不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，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。正如《论语·子路》中所说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”。在中央已明确下发了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禁令的情况下，淮安县委的同志，仍送来礼品，违反了中央的禁令不说，还会起到不良的社会影响。一旦各地领导干部效仿此法，请客送礼之风渐起，在全国人民生活还极其困难的时期，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。周恩来的担心也正在于此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对淮安县委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，周恩来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人情味呢？

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这封短短的“拒礼”信值得人们长久品味。

常悟 来源：人民网



陈毅副总理以及夫人张茜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夫人邓颖超在一起

陈毅在昏迷中喊什么？

1966年8月30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陈毅的手说：“陈老总，我保你。”陈毅坦荡地说：“不用主席保，我能过关，我是共产党员，我靠我的工作，能取得群众的信任。”

在上海市市长任上，除了在经济上与陈云配合着打赢“银元之战”和“棉纱之战”，陈毅更被后人所怀念的，是他对上海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尊重。陈毅说：“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。”那时候上海有很多电影公司、书店、文艺演出团体、报纸，陈毅跟夏衍谈，旧人员的清理，千万不能怕麻烦，不要采取简单的办法。上海市文史馆、参事室，原先安排了30多人。陈毅说：“太少了，人数加个零。”扩大10倍，上哪找人呢？向下要，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，这个不合条件，那个历史有问题。陈毅最后发了火：“你们这些人，连蒋介石都不如，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！怎么会没有人？上海三教九流、遗老遗少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，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，我们养得起的。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，来受你的教育，有什么不划算？！”

上海有个旧交响乐团，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，“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”。陈毅却指示保留，“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，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乐团”。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，不利于排练，在陈毅的关心催促之下乐团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。

1958年2月，副总理陈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一职，他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，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色彩的“外交辞令”。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，某国一位新闻记者问：“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-2型高空侦察机，请问陈毅先生，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？是导弹吗？”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，俏皮地说：“记者先生，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，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！”

还有一次，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：“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？”陈毅巧妙地说：“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，这是我们都知

道的事。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，

什么时候爆炸，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。”该表达愤怒的时候，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。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，在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，面对极端反华分子公开呼吁侵犯中国的时候，64岁的外交部长陈毅挥舞着双拳，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：“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，已经等了16年，我的头发都等白了。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，我的儿子会看到，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。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，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、欺人太甚。”

1967年2月，在中央碰头会上，陈毅、叶剑英等为一方，与以“中央文革小组”为另一方，发生尖锐冲突，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“大闹怀仁堂”、“二月逆流”。陈毅此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，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话，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。几天后，他盼来了回信，开头写了一段“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”的话，结尾写了八个字：“见面有期，稍安毋躁。”

1969年10月，陈毅被以“战备”为名，疏散到石家庄。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又卷入了所谓“二陈(陈毅、陈伯达)合流”。此后，陈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。1971年12月26日清晨，多日未进食的陈毅突然提出要吃面条，他费力地吞下了几根面条后告诉医生说：“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，我早上吃了面条……”最后时刻的陈毅在昏迷中经常喊道：党中央、毛主席、长征等等。1972年1月6日，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：“‘二月逆流’经过时间的考验，根本没有这个事，今后不要再讲‘二月逆流’了。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。”

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，叶剑英对着老战友说：“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，让姗姗念给你听。”姗姗在父亲耳边大声读完毛泽东的批示，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，姗姗对父亲说：“您要是听清楚了，就闭闭眼吧。”陈毅闭了闭眼。姗姗又念了一遍，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……

朱文轶 李菁

来源：老年文汇报

林彪政治上的“第一桶金”

1928年1月，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，连克资兴、永兴、耒阳等县城。2月29日，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赶往耒阳，途中遇到民团团丁的堵截，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。林彪决心复仇，朱德批准了他的计划。

3月3日早晨，林彪带领一批人马化装成“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”向小水铺开来。驻扎在小水铺的谭致生立即设宴款待，酒过三巡，林彪不动声色地将手中的酒杯一举，大厅里的20余名“国军”军官一齐开火，把谭致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。经此一仗，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，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。

接着的几件事，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。3月9日，李宜煊带领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。林彪主动请战，他说：“现在耒阳城内，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，戒备必定松懈，我军应该趁敌不备，大举反攻。”耒阳一战，起义军消灭敌军百余人，抓获俘虏80余名，可谓大获全胜。

经过此战，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：此人聪明绝顶，临危不惧，遇乱不慌，沉得住气，是个做大事的人。1928年3月，朱德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。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，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。可惜，对于发现他的“伯乐”，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。

1928年4月28日，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。这天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。会师后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。

在井冈山反“围剿”斗争中，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，林彪机智灵活、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。毛泽东开始注意这位年仅21岁的营长。1928年夏，红军在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“八月失败”。但“八月失败”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。这年7月下旬，红四军向湖南行进。8月28日，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投敌叛变。红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王尔琢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。王尔琢赶上二营后，高声喊话，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。袁崇全恼羞成怒，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，王尔琢当场牺牲。王尔琢在红四军中是仅次于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的第四号人物，他的死造成了很大损失。

毛泽东、朱德思虑再三，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，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。

二十八团有1900多人，战斗力最强，是红四军中有名的“钢铁团”。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。严格地说，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团长始，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、

“紧跟”毛泽东的历史。

1929年春，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、异常激烈的争论。争论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。朱德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；毛泽东坚决反对，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分权问题，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。在这场争论中，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，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。

这时，红四军准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，会议召开前，林彪派人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。他在信中说：“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，虚荣心极端发展。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，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。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，是不利于革命的。”另外，林彪还用了“政客手段”、“卑劣行为”、“阴谋”等语言，矛头直指朱德。

会议开始时，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，一下子将林彪置于众目睽睽之下。林彪也不含糊，他毫不隐讳地声明，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。

朱毛之争只不过是毛泽东与朱德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。但是在朱毛之争中，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，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，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，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了。

少华 来源：千龙网